

CHINESE TRANSLATIONS FROM
BUDDHIST LITERATURE

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 (上册)

孙昌武 编注



南开大学出版社

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

（上册）

孙昌武 编注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前 言

本书是历代汉译佛典翻译文学的选集。期望读者通过这部书,能够了解数量庞大的外来翻译佛教典籍里这一部分作品的概貌。

佛典,一般称为“佛经”,即经、律、论“三藏”,是佛教的根本典籍。我国翻译佛典年代可考最早的一部,是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所出《明度五十校计经》。此后直到北宋中期,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持续进行了九百余年(以后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①)。中外译师们从梵文、巴利文和各种“胡语”翻译出数千卷佛典。就翻译领域而言,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其贡献首先是在中国传播并发展了佛教,而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多方面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翻译佛典本来是佛教教理、教义的载体,但更包括了古印度、西域的文化、学术等十分丰富多彩的内容,其中有大量文学创作。这类佛典被称为“佛典翻译文学”。它们乃是古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作品,也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重要构成部分。

^① 宋代以后的译业,参阅周叔迦《宋元明清译经图记》,《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中华书局,1991年,第583~603页。

如荷兰学者许理和所说,“佛教曾是外来文学之影响的载体”^①。但作为学术概念,“佛典翻译文学”的内涵并不确定。按广义说,所有翻译佛典都可称作“翻译文学”;而按狭义说,则只有那些真正的文学创作如下面所讨论的“本生经”,才可算作“文学”作品。佛典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本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经典是单纯宣说教理的,谈不到什么文学价值;而有些却原本就是文学创作,是典型的“佛教文学”作品;难于判断的是形态在二者中间的大量经典,它们的某些部分具有文学意味或在某方面表现出文学性质。作为研究对象的佛典翻译文学,应把这后一类典籍包括在内。在众多翻译佛典里,宗教和文学两方面的内容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讨论其文学价值如何,只能就具体经典进行具体分析。但不论定义如何,可视为“翻译文学”的作品在整个“三藏”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巨大的。形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宗教与文学在性质上本来相通、佛教自产生以来就具有文学传统、佛教宣传需要借助文学形式等等,都是重要原因;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历代结集佛典大量利用了现成的文学资料,不少佛典是给文学作品附会以佛理形成的。

佛典翻译文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多样,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文学价值高、影响比较巨大的有以下几部分。

佛传

这是记述佛陀生平的一类经典,其中优秀者堪称传记文学的杰作,所塑造的佛陀形象也堪称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

据佛教史的记述,佛陀寂灭之后,大迦叶带领众弟子结集早期佛典(《阿含经》),已包含有佛传成分。到部派佛教时期,形

^① 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第二版序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成了叙述佛陀一生的完整佛传。由于佛教各部派关于佛陀的传说不尽相同，结集的佛传也有多种^①。如大众部的佛传名《大事》（Mahāwastu Awadāna，中土未译），法藏部称《本行经》^②。佛传是最早传入中土的佛经的一部分。按所出年代，现存汉译佛传有：东汉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异译吴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东汉昙果、康孟祥译《中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异译唐地婆诃罗《方广大庄严经》），东晋迦留陀伽译《十二游经》、北凉昙无讖译、马鸣作《佛所行赞》（异译刘宋宝云《佛所行经》），隋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宋法贤译《佛说众许摩诃帝经》等。除了这些表现佛陀一生的完整的佛传外，还有更多描写佛陀生平片断的较短小的经典，有些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各种佛传记述范围不尽相同。有的从佛陀前生写起，有的从释迦族祖先写起，有的从佛陀降生写起，等等。其核心部分是所谓“八相示现”（或称“八相作佛”，即下天、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或无“住胎”而有“降魔”）。值得注意、也是对形成其文学价值具有重要作用的是，虽然所描写的教主佛陀形象多有神秘、虚幻的成分，但基本是作为现实的“人”来表现的。例如描写作为“太子”的佛陀曾耽于世俗享乐，也曾结婚生子；求道过程中也犯过错误，也经受磨难和考验；等等。如此较强的现实性，是佛传作为文学创作的卓越之处。

汉译佛传中最为杰出的当数马鸣（公元2世纪）所造、昙无

① 日本学者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学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讚の研究》把佛传的发展细分为四个阶段，可供参考；详该书第139～166页，日本印度学研究所，1967年。

② 参阅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13页。

谶所出《佛所行赞》(另有宝云异译)。这是一部古印度宫廷诗体的近万行的长篇叙事诗,创造了佛传艺术的新的巅峰。又汉译各种佛传中《佛本行集经》形成时代靠后,篇幅最长,内容最为翔实,艺术表现也相当充分。

除了描写佛陀生平的佛传,有些佛典还描写了他的家族、亲友、弟子、信徒以至反对者、敌人等各色人物,围绕这些人物不乏有趣的故事。如舍卫国大臣“给孤独长者”须达以黄金铺地构筑“祇树给孤独园”事,见于有部律《破僧事》、《佛所行赞》和《贤愚经》、《摩诃帝经》等多种经典中;又如《佛说奈女耆婆经》,所述耆婆本是王子,习医有成,能照见五脏、破痼医病,后皈依佛陀,是反映古印度医术成就的“神医”故事。在《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作品里,可以清楚发现这些经典影响的痕迹。

本生故事

在佛典翻译文学中,《本生经》或称“本生谭”是艺术价值最高、也最为普及的部分之一,被称为是古印度“民间寓言故事大集”^①,是可与希腊伊索寓言并称的古代世界寓言文学的宝典。

昙无谶所出《大般涅槃经》说:

何等名为闍陀伽经(《本生经》另一音译)?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黑、作麀、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②

《本生经》的形成大体与结集佛传同时。部派佛教时期,形

① 季羨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

② 《大般涅槃经》卷十五《梵行品》,《大正藏》第12卷第694页(以下引用《大正藏》简称《正》)。

成了“三世诸佛”、“过去七佛”观念，从而神圣、永生的佛陀就有其过去世；赞美佛的过去世，就出现了《本生经》。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阿育王（前 268？—前 232？）时所建桑奇大塔牌坊浮雕里已多有本生和佛传故事。东晋法显西行求法，在天竺曾到本生故事所讲的菩萨割肉贸鸽、施眼、舍身饲虎处；在师子国（斯里兰卡）他遇到王城供养佛齿，在仪式上“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以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像，皆采画装校，状若生人”^①。义净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里同样记载了五印流行本生故事的情形^②。

在南传巴利文佛典里，保留有完整的《本生经》，计 547 个故事，是五部《阿含》中《小尼迦耶》（小部）的第十部经。已经佚失的、在我国南北朝时期传译的《五百本生经》可能就是这部经的译本^③。汉译佛典里没有南传《本生经》译本，可是流行最广的本生故事大体有相当的译文。比较集中地保存本生故事的汉译佛典有十几部，其中吴康僧会所出《六度集经》（计包含 91 经）、西晋竺法护所出《生经》（计包含 31 经）、失译《菩萨本行经》（计包含 24 经）等比较集中；此外各种不同类型的譬喻经以及《贤愚经》、《杂宝藏经》里也包含有不少；佛传如《佛本行集经》也编入不少本生故事：还散见于其他经、律、论之中。

构成《本生经》的主要方式是把传说的佛陀前世善行附会到

①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35、36、38、154 页。

② 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82～183 页。

③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五百本生经》未详卷数，阙。……右一部，齐武皇帝时，外国沙门大乘于广州译出，未至京都。”这部经大概就是巴利文本《本生经》。苏晋仁等点校本，第 63 页。

现成的民间故事之中。“这一类故事和另外一种完全是夸张想象以至堆砌词藻的经和故事显然是两种风格，有两种来源，起两种作用”^①。《本生经》原来的体裁多种多样，有神话、传说、寓言、传奇故事、笑话（愚人故事）、诗歌、格言等等，译成汉语多采用韵、散结合的译经文体。其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是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故事，显然原本是民间寓言；又根据历史家考察，如“顶生王本生”、“大善见本生”，本来是古印度先王事迹传说；有些故事与古印度叙事文学传统相关，如汉译《六度集经》里的“未名王本生”和《杂宝藏经》里的“十奢王缘”，情节合起来就是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的提要。后出的故事有些可能是信仰者逐渐创作的。后来在佛教流行的西域地区也不断有新作品出现，汉译有些应是出于西域的。

汉译《本生经》有固定的结构。一个故事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佛陀现世情形，比较简单；另一部分是他过去世的行事，讲他在过去世示现为动物如鹿、猴、兔、鸽等或示现为国王、贵族、商人、平民、穷人、婆罗门等，积累精勤修道的善行；最后部分是关联语，由现世的佛陀说明过去世与现世的关联，指出当初行善的某某就是佛陀自己，作恶的某某是现在加害或反对他的人，从而表达教义或教训的喻意。在巴利文原典里，在过去世故事之后有偈颂，还有一段解释偈颂的文字，汉译里没有这两段。

值得注意的是，本生经本是部派佛教的产物，但汉译本生却更多地表现大乘积极入世、“自利利他”的菩萨观念。菩萨舍己救人、舍身求法是常见的主题。还有些故事具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宣扬仁惻慈悲、愍伤众生，批判统治者执操暴虐、贪残为法，表现和平富足、国泰民安的社会理想。并多使用“仁”、“德”、

①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173页。

“孝”、“忠”等词语，表现“天”、“命”等观念，则是译者把儒家伦理融入其中了。

譬喻故事

《杂阿含经》记载佛陀说的话：

今当说譬，大智慧者以譬得解。^①

《法华经》记载佛对舍利弗说：过、未、现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佛法”。佛陀生前善于“对机说法”、“应病与药”，利用譬喻是对弟子和民众宣扬教义的有效方式。后来历代佛弟子发扬了这一传统。许多经典更指出譬喻乃是一种方便施設，从而在教理上论证了运用譬喻的合理与必要。

佛典初传中土时，其多用譬喻的特点已引起人们的注意。《理惑论》里记载攻击佛教的言论说，“佛经说不指其事，徒广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和异为同，非事之妙，虽辞多语博，犹玉屑一车，不以为宝矣”；而作辩解时则引用圣人之言为例：“自诸子讖纬，圣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独恶佛说经牵譬喻耶？”^②从广义说，前面所讨论的佛传和本生故事也可说是譬喻文学作品；但还有一批以“譬喻”为名的专门经典，它们也和民间文学创作有密切关系。1926年鲁迅先生为校点本《百喻经》作题记说：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

① 《杂阿含经》卷十，《正》第2册第71页。

② 《弘明集》卷一，《正》第52卷第4页。

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①

前此的1914年，鲁迅曾出资刊刻《百喻经》，次年并亲自校阅，写有后记^②。鲁迅十分重视《百喻经》所代表的佛典譬喻文学的价值。

佛典里所谓“譬喻”，从简单的修辞格的譬喻到完整的譬喻故事，含义有多种。印度佛教对经典进行分类，有所谓“十二分教”或称“十二部经”；其中一类“阿婆陀那”（avadāna）意即“譬喻”，其本意是“英雄行为的故事”，这些故事作为教义的说明，即是一种譬喻^③。十二部经里的尼陀那（nidāna）即因缘，记载佛陀说经或制律的缘起，也是一种譬喻故事。全部佛典又随处可见譬喻情节。而专门以“譬喻”立名的经典，汉译现存多部：有题为吴康僧会所出《旧杂譬喻经》、题为支娄迦谶所出《杂譬喻经》、失译《杂譬喻经》、比丘道略集·鸠摩罗什译《杂譬喻经》（有异本《众经撰杂譬喻经》）、僧迦斯那撰·南齐求那毗地所出《百句譬喻经》即《百喻经》等。又西晋法炬·法立所出《法句譬喻经》是解释偈颂“法句”的，同样以譬喻故事为主要内容。这后一类是一般所谓“譬喻经”。见于资料的这类“失译杂经”有很多。据僧祐统计一卷已还者五百余部，“率抄众经，全典盖寡。观其所抄，多出《四含》、《六度》、《道地》、《大集》、《出曜》、《贤愚》及《譬喻》、《生经》，并割品截偈，撮略取义，强制名

① 《痴华鬘》题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7卷101页。

② 《〈百喻经〉校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45页。

③ 在汉语翻译里“阿波陀那”经常译为“譬喻经”或“譬喻”，如《增一阿含经》卷一七：“或有比丘高声颂习所谓契经……譬喻……”，又《四分律》卷一：“契经……譬喻经……”，说的都是专门一类关于“英雄故事”的经典。

号，仍成卷轴”^①。多数“譬喻经”就是这种出于中土的经抄^②。正因为是抄撮而成，这些经典收录的故事多有相互重复的。

除了这些名为“譬喻”的经典之外，还有两种经典亦属同类。一种是单本譬喻经，如《箭喻经》等。周叔迦论《天尊说阿育王譬喻经》说：“东晋佚名译。按此经所记，率取故事以证嘉言，约如我国《韩诗外传》体例。凡十二则……大率取譬浅近，引人皈信，与《杂宝藏经》、《百喻经》等，殊途同归。取此种经典，与六代《搜神记》、《颜氏家训》诸书互相辜较，天竺思想影响中土程度，亦可窥一二矣。”^③此外一般经典里也多夹叙譬喻故事，如节录出来也往往是很好的譬喻作品。

譬喻故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往往具有普遍的哲理或伦理意义；它们形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其背景或内容又往往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体现一定的社会意义。其中许多应出于印度或西域民间传说，或是模仿民间传说制作的，大抵短小精悍，富于情趣，又通俗易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间文学质朴、风趣的艺术特色。

因缘经

除了上述几类经典富于文学性，可视为典型的佛典翻译文学之外，还有以下三类经典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从广义上也应看作是文学作品。

① 《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出三藏记集》卷四，第123页。

② 现存的“譬喻经”除《百喻经》有梵文原本外，其他均不见外语原典，所以有人认为它们都是“在中国结集成书的抄译经”。参阅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第六章《譬喻佛典研究之三——六部以“譬喻”为名的佛典》，东初出版社，1996年，第275～388页。

③ 《释典丛录》，《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中华书局，1991年，第1024～1025页。

佛教本是引导人们修证成佛之教。但即使是教主佛陀也没有造物主、救世主的性格。他是“觉悟”的榜样、修道的典范，是众人的“导师”、“慈航”。这样佛教经典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宣扬修道行为，树立成道典型。而因缘观念本是佛教教理的一个基本点。所以现世信徒的行为，从发心皈依直到成就佛果，都处在因缘关系之中，都是因缘所决定的。所以佛典里讲修道、成道的故事，大体都归结到因缘这一“主题”上来。姑且把这类经典称为“因缘经”。

经典里这类故事很多。有些夹叙在大部经典里，特别是一些经的“序分”就是生动的因缘故事。如《观无量寿经》中韦希提夫人解救丈夫、请佛救济的哀婉动人的故事就是典型例子。另一种是专门结集的故事集，汉译作品里文学价值较高的主要有题为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马鸣撰、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等。梁宝唱所编《经律异相》里也有许多这类故事。就具体作品而言，本生、譬喻、因缘这三种内容往往是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的。以上列举的几部经典里也包含有不少本生故事，而有些因缘故事也具有譬喻意味。

法句经

所谓“法句”(Dharmapada)，意谓真理的语言，即传达佛陀教法的偈句。早期佛典靠口头传诵流通，使用的是韵文体的偈颂体裁。“长行”的散文本是后出的。而就汉译而言，有些原本是韵文的经典被翻译成散文了；偈颂则形成一种特殊的“诗体”。古代沙门从众经中把富于教化意义、而又简练精赅的偈颂拣选出来、分类加以编辑，成为专门一类经典《法句经》。汉译现存四部：吴维祗难等译《法句经》二卷，法炬共法立译《法句譬喻经》

四卷，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三十卷，宋天息灾译《法集要颂经》四卷。据考前二者是出于巴利文系统的，后二者是出于梵文系统的。它们的内容大体相同。不过第一、四两种全是韵文偈颂；二、三两种则韵、散间行，以散文宣说义理或举出故事为例证，也可说是一种譬喻经。法句偈颂是宣扬佛理的，又多是较早期的译品，义理的解说、文句的组织多生涩窒碍，没有多少诗的意趣。但也应肯定，这些使用特殊韵文的经典还是具有一定文学意义的。一方面这种只取句式整齐、用韵相当自由的韵文，给中土韵文输入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风格；另一方面，有些“法句”能够强悍生动地说明道理，并能灵活地运用譬喻、象征、联想等修辞手法，可以看作是哲理诗，这些对中土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此外，从一定意义上看，有些大乘经的文学性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大乘经的结构，均组织在佛陀于某时、某地、对某某说法的框架里，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叙事和描述性格。而其叙事和描述又大都富于想象和玄想。当然，就具体经典来说各有特征。如各种《般若经》，基本是思辨说理，谈不到文学性。而如《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等则更多是叙事和描述，更富于故事性和形象性。就论书而言，从性质说它们本是解释经典的，表达以议论为主，但也包含不少譬喻故事。所以如《大毗婆沙论》、《大智度论》等大、小乘论书，也被看作是譬喻文学的宝库。

上述佛典翻译文学对历代文人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王国维曾指出：

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

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①

具体论及文学的发展，刘熙载则说：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②

这都是说，佛书传入中土，推动中国文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佛典翻译文学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随着时代推移，这种影响在今天是难以体会到了。

上述各类数量庞大的“佛典翻译文学”作品，由于其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自然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从而在佛教传播中起着特殊作用。就文学领域而言，它们被历代文人广泛诵读、赞赏，对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等诸方向产生影响；而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翻译文学作品，更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创作。这后一方面是文学史研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这种影响大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文学语言

语言是文学的表现工具，文学创作是语言艺术。佛典传译大量输入了外民族的词汇、语法和修辞方式、表达方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达手段。从词汇看，翻译佛书输入了大量外来语新词和新的构词法。翻译词语的方法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利用汉语固有词语赋予新概念，如“空”、“真”、“观”、“法”之类；一种是利用汉语词素组合成新词语，如“四谛”、“五蕴”、“因缘”、“法界”之类；再一种是重新创造，如实际、境界、法门、意识、大千世界、不可思议、万劫难复、头头是道等等。还

① 《论近年之学术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静安文集》。

② 《艺概》卷一《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页。

有音译词，即玄奘所谓“五种不翻”^①的词，如般若、菩提、陀罗尼、阎浮提等；这一种又包括音、义合译的，如禅定、偈颂、六波罗密、阿赖耶识等。随着佛典翻译传入汉语的词语数量难以统计，许多已经成为汉语的常用词语，如机会、烦恼、赞助、本来面目、大千世界、回光反照等等。词汇本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此众多的新词语输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语言。从语法看，梁启超曾指出：

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它书迥然殊异。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二）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俚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挈句法极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六）多复牒前文语；（七）有连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一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同格的词语，铺排叙列，动至数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土。质言之，则外来语调之色彩甚浓厚，若与吾辈本来之“文学眼”不相习，而寻玩稍近，自感一种调和之美。^②

这都是语法修辞方面的表现。此外还有叙述中插入呼语（如“时我，世尊！闻说是语，得未曾有”）、多用复合句等等。音韵方面，由于转读佛经，启发中土人士发明反切、四声；而声韵学的进步

① 周敦颐：《翻译名义序》，《正》第54卷第1055页。

② 《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台湾中华书局，1976年，第28—29页。

直接影响到各种韵文文体特别是诗歌格律的演进。又由于佛典翻译促成汉语和外来语长期、广泛的交流，影响到汉语文的文风，如什译《法华》“有天然西域之语趣”^①，是成功译经的典型例子，也必然影响世俗文字。

2. 文体

译经经常使用韵、散间行的文体。印度佛教对佛典分类，划分为“十二分教”，其中的“伽陀”，即所谓“偈”、“偈颂”，或称“孤起颂”，是独立宣说教义的韵文。比如前述《法句经》里的法句即是。另一类叫“祇夜”，或称为“重颂”、“应颂”，是经文里重复宣说散文意思的偈语。韵、散的配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散文后面用韵文加以渲染，二者是重复的，如《法华经》描写“火宅”，在散文叙述火宅的恐怖之后，再用韵文细致描写一遍；另一种是二者各自表现独立的内容。后一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法句譬喻经》，先出“法句”偈颂，然后用散文讲故事；再一类是叙说中时而用散文时而用韵文。这多种韵、散配合的文体给中土创作以启发。如陶渊明的韵文《桃花源诗》配以散文《桃花源记》；唐人写传奇小说也常常以诗歌相配合，这应受到佛典文体的一定影响。还有后出的韵、散并用的文体，如胡适所说：

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韵文是有节奏之文，不必一定有韵脚）重说一遍。这韵文的部分叫做“偈”。印度文学自古以来多靠口说相传，这种体裁可以帮助记忆力。但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

① 《宋高僧传》卷三《译经论》。

得来的。^①

此前的变文、宝卷则更直接地取法佛典韵、散结合的行文方式。

3. 行文体制

长期的译经实践，形成了一种“译经体”。这是一种华梵结合、韵散间行、雅俗共赏的行文体制。魏晋以来，文章“骈俪化”日渐严重，行文讲究对偶声韵、使典用事，多用华词丽藻，刻意追求形式美，文坛弥漫着绮靡、唯美之风。而胡适谈到翻译文体说：

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也不是那含糊不正确的骈偶文体所能对付的。结果便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新材料和新意境是不用说明的，何以有新文体的必要呢？第一因为外国来的新材料装不到那对仗骈偶的滥调里去。第二因为主译的都是外国人，不曾中那骈偶滥调的毒。第三因为最初助译的很多是民间的信徒；后来虽有文人学士奉敕润文，他们的能力有限，故他们的恶影响也有限。第四因为宗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多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意”相勉。到了鸠摩罗什，译经的文体大定，风气已大开，那般滥调的文人学士更无可如何了。^②

这种“译经体”基本是流畅明白的散体。翻译偈颂则是一种不规则的韵文，用了五言、四言、七言或六言句，基本不用韵，节奏

① 《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② 《白话文学史》第115页。